



殷墟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概述*

General Description on Yin Ruins Jade Objects' Discovery and Research

丁思聪¹ 唐际根²

Ding Sicong¹ Tang Jigen²

(1.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郑州, 450001; 2. 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 518055)

(1.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2.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内容提要: 自从科学的考古发掘开始以来, 殷墟玉器的材料不断积累。现有对殷墟玉器的研究, 主要着眼于定名与分类、考古学文化、原料和产地、制作工艺、次生变化、文献学、玉器使用制度与社会文化等方面。妇好墓出土玉器在殷墟玉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使得相关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偏向。推进现有的殷墟玉器研究, 有赖于玉石材质科学鉴定、玉器工艺研究、系统的类型学分析、文献学研究以及用玉习俗研究等领域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 殷墟玉器 考古学 妇好墓

Abstract: Jades unexcavated in Yin Ruins mounted up continually sinc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tarted. Current studies about Yin Ruins jades mainly focus on naming and classificati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mineral species and sources, jade-carving technology, secondary alteration, historical philology, jade-using custom and consuetude rite, etc. Jades uncovered in Fuhao Tomb played a major role in Yin Ruins jades, and led to certain inclin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es. Current studies could be furthered through scientific detection on materials, microscratch observation of jade-carving technology,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and periodization studies on historical philology, research of jade-using custom, etc.

Key Words: Yin Ruins jades; archaeology; Fu Hao Tomb

本文所说的玉仅指软玉, 由于多数出土玉器缺乏科学鉴定, 玉石的界定不免带有主观性, 因此将墓葬所出玉器和石器一并收入, 遗址所出仅择名为玉器者。

一、殷墟玉器的发现

1. 民国时期 (1928-1937)

这一时期, 殷墟玉器持续发现。1928年10月小

*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 16BKG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屯试掘出土玉石器42件^[1]。

1933—1934年后冈殷墓出土玉器2件、石器162件^[2]。

1934—1935年发掘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由于盗掘破坏，出土玉石器多为残片。其中侯家庄M1001出土玉石器1016件^[3]，M1002出土玉石器309件^[4]，M1003出土玉石器179件^[5]，M1004出土玉石器220件^[6]，M1129出土石器1件，M1400出土玉石器10件，M1443出土玉石器85件^[7]，M1217出土玉石器227件^[8]，M1500出土玉石器171件^[9]，M1550出土玉石器243件^[10]。此外，在小墓和祭祀坑内共发现玉石器8件^[11]。

1936年秋大司空村墓葬出土石器9件^[12]，小屯乙七基址以南的北、中、南三组墓葬和祭祀坑共计出土玉器64件、石器34件^[13]，小屯乙区基址上下墓葬和祭祀坑出土石器27件^[14]。

1937年小屯丙区墓葬出土玉石器172件^[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恢复殷墟考古，玉器资料不断积累。

1950年春发掘的武官大墓出土玉器10件、石器36件。同年发掘的四盘磨西北和五道沟西南岸墓葬出土玉器9件^[16]。

1953—1954年大司空村遗址出土玉器3件，墓葬出土玉器55件、石器44件；M175车马坑出土石戈1件、石觶1件^[17]。

1957年8月在薛家庄南地出土璧戚、柄形器、筭、蝉等玉器5件^[18]。秋季，高楼庄墓葬出土璧、琕、筭、玉饰等玉器6件^[19]。同年11月发掘的薛家庄M1出土玉柄形器1件^[20]。

1958年春大司空墓葬出土玉器19件、石器11件^[21]。

1958—1961年在殷墟多个遗址点发掘玉器12件；后冈圆形祭祀坑内出土玉器4件、石蚌串珠1串；墓葬出土玉器55件、石器76件^[22]。

1962年秋大司空M53出土小玉饰和石俎各1件^[23]。

1969年春在武官村北的王陵区祭祀坑出土玉器7件、石器2件^[24]。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共出土玉器275件、石器402件^[25]。

1971年后冈殷墓出土石器27件^[26]。

1973年小屯南地遗址出土玉器4件^[27]。

1975年冬小屯村北房址F10和F11出土玉器14件、石器数百件^[28]。

1975—1985年在小屯西北地遗址出土玉器2件，墓葬出土玉器24件、石器18件（另有绿松石片若干），此外在祭祀坑内出土玉柄形器7件和绿松石片若干^[29]。1976年5月发掘的小屯M5（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石器110件^[30]。1976年底发掘的M17和1977年春发掘的M18共出土玉器12件^[31]。

1978年5月发掘的侯家庄北地M1出土玉器18件、石器40件^[32]。

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出土玉环1件、玉璧3件^[33]。

1980年夏发掘的三家庄东墓葬出土玉器18件、石器2件^[34]。大司空M539出土玉管2件、石鱼1件、石镰1件、磨石1件^[35]。

1980—1981年梅园庄南墓葬出土玉器5件、石器1件^[36]。

1980—1982年苗圃北地墓葬出土玉器8件、石器7件^[37]。

1982—1992年郭家庄西南墓葬中M160出土玉器33件、石器6件。其余墓葬出土玉器45件、石器45件（同墓所出小石子算作1件，下同）^[38]。

1983年春薛家庄东南墓葬出土玉器3件、石器3件^[39]；11月郭家庄M1出土玉片2件^[40]，同年大司空M663出土石器10件^[41]。

1983—1986年刘家庄墓葬出土玉器21件、石器2件^[42]。

1984年6月西区M1713出土玉器2件、石器20件^[43]；9—10月戚家庄东M269出土玉器6件、石器1件^[44]；秋，苗圃北地墓葬出土玉器2件、石器10件^[45]。武官村北王陵区M260出土玉器16件、石器41件^[46]。

1984—1988年大司空村北地出土玉器6件、石器10件^[47]。

1985年铁西刘家庄南墓葬出土玉器85件、石器1件^[48]。

1985—1987年梯家口墓葬出土玉器9件、石器1件^[49]。

1986—1992年在安阳市太平庄西、市汽车站、郭家湾村北、东八里庄村东、和平路中段等5个地点发掘出土玉器19件、石器2件^[50]。

1986年秋大司空南地M25出土玉器9件，M29出土玉器2件^[51]，年底郭庄村北M6出土玉器5件^[52]。

1986—1987年花园庄南地遗址出土玉斗1件、玉



鸚鵡1件、玉柄形器1件^[53]。

1987年夏郭家庄东南墓葬出土玉器10件、石器7件^[54]。秋，梅园庄南地墓葬出土玉器9件、石器27件^[55]。

1987年对小屯甲组基址再发掘出土残玉戚1件、石器22件。1988-1996年发掘的小屯丁组基址祭祀坑M10出土磨石2件^[56]。

1988年刘家庄北地殷墓共出玉器6件、石器6件^[57]。

1989-1990年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玉器32件、石器49件^[58]。

1990年5月在梅园庄西发掘的90市建行营业楼M1出土玉珠1件、水晶璜1件^[59]。

1991年后冈墓葬出土玉器2件、石器61件^[60]，11月在高楼庄南发掘的91县物资局M1出土玉器15件、石器4件^[61]。

1992-2002年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玉器224件、石器6件；其余墓葬出土玉器7件、石器17件^[62]。

1995年徐家桥村北墓葬出土玉器5件、石器1件^[63]。郭家庄东南M26出土石戈1件、石钺1件^[64]。

1995年冬-1996年春刘家庄M32出土磨石1件^[65]。

1997年王裕口南地墓葬出土石虎2件、绿松石饰1件^[66]。

1998-1999年洹北花园庄东地墓葬出土玉器2件、石器7件^[67]。

1999年刘家庄北M1046出土玉器6件、石器60件^[68]。

2001-2002年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基址祭祀坑内出土玉柄形器4件^[69]。

2002-2008年对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其中双墓道的M2118出土玉器2件、石器8件，M22出土石器6件^[70]。

2003-2004年孝民屯发掘中，打破环状沟的墓葬M132出土玉器残片1件^[71]。另外见于报道的M17和M207出土玉器11件、石器8件^[72]，小屯西地双墓道大墓M1出土玉器8件、石器6件^[73]。

2004年安阳大司空遗址出土璋、璧、磬等石器11件；墓葬出土玉器15件、石器36件^[74]。

2004-2005年殷墟宫殿宗庙区甲五基址西北发现一处玉料坑，遗址内采集玉璧残片1件^[75]。

2004-2008年徐家桥郭家庄多处墓葬共出土玉器

42件、石器30件^[76]。

2005年7月范家庄东北地M3出土玉器3件、石器1件，M4出土玉器6件^[77]。

2008年刘家庄北地M508出土玉虎1件，M35出土磨石2件^[78]。

2009年王裕口南地M94出土玉器6件，M103出土玉器9件^[79]。

2010-2011年刘家庄北地M70出土玉戈1件^[80]。

二、殷墟玉器的研究

1. 定名和分类的研究

商代玉器的定名，尤其玉礼器名称，早先存在被混淆的情况。夏鼐先生的《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结合文献，对商代玉器的定名进行了考证和规范^[81]。例如对璧、环、瑗的区分，对斧、铲、钺、戚的区分，对璇玑、圭、璋、柄形器名称的考释与纠正等。然而，商代玉器的名称和用途仍然存在争议。例如柄形器，有的学者认为是裸礼用的“璮”^[82]，有的认为是“璋”^[83]，有的认为是“大圭”^[84]，有的认为组合玉柄形器是“命圭”^[85]，有的认为是祖先牌位“石主”^[86]，有的甚至认为是“玉剑”^[87]。

商代玉器的分类，大致有功能分类、形态分类两种方法。功能分类以夏鼐先生为代表，他以考古方法为本，将殷墟玉器分为礼器、武器和工具、装饰品几大类^[88]。郑振香、陈志达也使用了类似的功能分类法^[89]。另有以文献为主要依据的功能分类，以那志良为代表，将出土玉器与传世品纳入文献记载体系，将玉器分为礼器、符节器、服饰器、镶嵌器、丧葬器、兵器、乐器、像生器、简册、用器等^[90]，这种纯粹以文献为依据的玉器分类方法被称为经生的方法。由于部分器物功能难以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复原，分类中不免有主观因素，另一部分学者另辟蹊径，依据玉器形制进行分类。形态分类最早由郭宝钧提出，将殷末周初玉器分为圆曲、直方、像生和不可归类者四大类^[91]。后来使用相似方法者还有黄翠梅^[92]、刘森淼^[93]等。



2. 考古学文化研究

较为系统的商代玉器分期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郑振香、陈志达根据殷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将玉器分作早晚两期^[94]。杨建芳将商代玉器分为二里冈期、殷墟前期和殷墟后期三期，以器形、纹饰的变化为线索，归纳了像生器、玉戈以及玉器纹饰的演变^[95]。曲石则将商代玉器分作二里冈时期和殷墟时期两期^[96]。近年来刘敏将殷墟玉器进一步细分为两期三段，其中殷墟晚期玉器被细分作两段^[97]。

殷墟玉器发展源流的梳理，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王巍、郑振香等学者对殷墟玉器的来源进行了讨论，将其追溯至二里头文化，乃至新石器末期的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98]。对前代旧器的识别也有了一定的进展^[99]，类型学和科技分析成为了辨别旧器的依据。

在综合性研究中亦有对商代玉器特征的论述。郜向平统计了商代各个阶段玉器发现的种类和数量，并对其面貌和演变进行了总结^[100]。石荣传对三代至两汉的玉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归纳，将其分为十期，其中涉及商代者有夏至早商、商代晚期和商末周初三期，概括了各个时期的玉器主要特征。他还将三代至两汉的玉器分为仪玉、佩玉和葬玉三大类，分别讨论了各类器物的使用制度和发展过程^[101]。

此外，还有对于殷墟玉器的专题研究，例如玉礼器的研究^[102]，有领璧（环）来源的研究^[103]，玦的研究^[104]，玉鹿的研究^[105]，随葬小石子的研究^[106]等。

3. 原料和产地研究

玉器的原料问题包括玉器的材质鉴定，玉料的来源和玉器的加工地等。李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殷墟60余件玉器标本进行了硬度和比重分析，并认为“殷商时代玉器的原料是以软玉为主体的”^[107]。

1976年妇好墓发现以后，发掘者先后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有关人员对于大约300件标本进行了鉴定。根据目检结

果，认定“基本上都是新疆玉”，另有少量岫岩玉和独山玉^[108]。地质研究所的张培善通过对妇好墓部分玉器残片进行了切片鉴定，认定所测标本均为透闪石软玉，但对原料的来源较为谨慎^[109]。夏鼐先生亦持有相同态度^[110]。20世纪90年代，闻广先生对殷墟所出30余件玉器标本进行科学鉴定，除少量材质为叶蛇纹石、石英岩外，大多数样本被鉴定为透闪石软玉^[111]。

本世纪以来，殷墟考古报告出土玉器材质的科技分析有所增加，依然以附录形式置于正文后^[112]。其中荆志淳等对花东M54的分析将玉器材质与其社会功能紧密结合，注意到旧器、外来器及原料来源等一系列问题。

玉器原料产地的确认一方面需要考古材料的积累，一方面也需要配合玉矿调查。商代考古相应的玉矿调查还正在方兴未艾阶段。荆志淳在分析花东M54出土玉器时，曾经推测含有少量蛭石的B类软玉，色泽以深绿为主，主要用来制作大型礼器，可能与其他软玉有着不同来源^[113]。而近年来对安阳黑河路石璋进行材质分析时发现存在大理石与透闪石伴生的情况，而附近的太行山地区具备同样的地质条件^[114]。距离安阳不远的洛阳栾川县伏牛山腹地，也已经发现有蛇纹石矿脉中伴生透闪石的情况^[115]。叶晓红等对鄂、豫、陕地区绿松石矿脉进行的调查，亦为殷墟绿松石原料的来源提供了线索。

4. 制作工艺研究

殷墟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开展较少。

妇好墓发掘后，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该墓玉器的制作技术进行分析，提出勾彻技术是当时玉器施纹的主要手法，并对琢玉工具进行了推测^[116]。

蔡庆良通过对造型和纹饰的考察认为殷墟玉器在设计 and 制作的整套流程中贯彻了简洁明确的原则，器物的造型、母题和纹饰均呈现出标准化取向，从而形成了晚商时期特有的刚劲严肃的风格^[117]。

陈启贤对殷墟花东M54部分玉器微痕进行显微观察，推测和复原了加工技术和工具^[118]。



5. 次生变化研究

玉器的次生变化（包括俗称的“沁”），有开采前的自然风化、自然埋藏后的“受沁”和人为造成的次生变化几种不同的情形，与玉料的质地、埋藏玉器的土壤、玉器的接触物和摆放位置等均有关系^[119]。

商周时期玉器次生变化的专门研究较少，常常仅在玉器科技分析中附带提出^[120]。荆志淳等通过分析殷墟花东M54玉器的次生变化后发现，B类质地的玉礼器表面往往发生了通体次生变化，而同墓所出其他类的装饰品则多未出现次生变化，这可能与当时人们有意或无意烧玉的行为有关^[121]。

6. 文献学研究

商周时期部分玉石器表面有朱书、墨书文字，或器表刻铭的现象，这为讨论玉器的功用提供了证据。殷墟玉器以前一种为常见，文字常书写于柄形器或石璋上。学者们对文字内容进行解读^[122]，并据此推测器物功用乃至社会礼制等^[123]。例如李学勤将刘家庄北地M1046所出石璋墨书文字“𠄎于某人”释作“裸”，认为这些石璋为裸玉，将其日名进行排列，认为是其墓主男性亲属的世系，据此推测殷末的商人已经有了规范的亲族制度^[124]。

刘源对殷墟所出虎首人身石雕像进行考证，认为很可能是《山海经》所载的彊良，起到驱鬼镇墓之用^[125]。

7. 玉器使用制度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郭宝钧在其古玉分期体系中将殷末周初玉器概括为“玩好期”，其特征为“偏重玩好，渐远实用，好事琬琰，增加象生”，各类器物“仍系各自为用，无系统之组合”^[126]。刘森淼对商代墓葬出土玉器的组合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可能不存在严格的用玉制度”^[127]。黄翠梅亦指出“商代玉器在礼制上不仅不具有明显和规范性的象征意义，更像是为了彰显墓主个人财力的珍玩”^[128]。

郜向平对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墓葬所出玉器进行统计，发现殷墟时期出土玉石器的墓葬比重呈下

降趋势，玉礼器的数量减少并发生变异，而装饰品则大增，认为这同玉器礼制意义的衰落相关^[129]。玉器礼制意义的衰落，与商代青铜礼器的繁盛相映成趣。

然而，商代玉器的使用制度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常洁对安阳殷墟墓葬出土玉器进行分析，将其分为礼玉和用玉两大类，观察到级别不同的墓葬中，玉器的类别、数量亦有别，反映了“上可兼下，而下不可兼上”的礼制^[130]。

了解商代的用玉制度，需要以具体的出土背景为线索。荆志淳、唐际根认为商代的装饰类玉器“反映的是个性化特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更多地与个人身份、文化传统和财富相关”，相对而言，玉质的武器、工具则“似乎遵循一定的用玉制度。它们可能更多地象征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选择特定类别甚至特定地点的玉材，以体现制度化器物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从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来看，商代的青铜器往往出现在棺外椁内、二层台上、填土中等位置，而玉器多随葬在棺内。这一差异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关系，“玉器主要体现墓主自身生前和死后的社会身份，而青铜器更多显示的是生者和死者的关系、送葬者相互之间的关系”^[131]。

三、妇好墓玉器在殷墟玉器中的地位

妇好墓无疑是殷墟玉器最重要的发现。殷墟的商王陵和高级贵族墓历代遭受盗掘，破坏几尽。幸免于难的妇好墓，其主人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妃，虽然墓圻规模并不大，但使用了10套铜觚爵礼器，随葬有规格极高且数量庞大的铜兵器和玉石器组合，其规格不亚于某些带一条墓道或者两条墓道大墓的墓主人，墓内随葬玉器亦是晚商时期用玉习俗的高规格代表，其中所见的玉器亦代表了商代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从玉器的断代和分期、社会制度研究、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研究、工艺技术研究等角度而言，妇好墓出土玉器是极佳的研究材料。

妇好墓玉器形制多样、数量庞大，几乎涵盖了晚商玉器的所有类别，深刻影响到了殷墟玉器的考



古类型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对殷墟玉器乃至商代玉器进行类型学研究时，无一例外地把妇好墓玉器作为典型墓例进行研究，其出土玉器的面貌支撑起了殷墟二期时段，乃至殷墟早期玉器的整体特征，亦成为了商代玉器巅峰的表征。

妇好墓玉器对于商代社会生活研究和丧葬习俗研究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墓内随葬玉器中，部分可被认定为前代传世品，如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M5：948、红山文化玉勾形器M5：964、石家河文化玉凤M5：350等，这些较为稀有的前代旧器，反映了商代贵族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殷墟时期高规格墓葬中的玉石礼器组合，与铜礼器、铜兵器组合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随葬有大型石像生者通常为商王或王室成员，随葬大理石容器者往往是拥有3套以上铜觚爵的中、高级贵族墓。以翹首刀、钺（戚）、戈、矛、镞为代表的玉兵器组合，通常可与卷首大刀、钺、戈、镞的铜兵器组合相对应。玉石器在墓内摆放位置的不同，既反映了当时的赠赙制度，也反映了其与墓主人的关系和器物自身的重要性。玉石器放置于棺内的，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和佩戴、使用；放置于椁室内和棺椁顶部的，为墓主人亲友、臣僚所赠送，其位置的正与偏、远与近也反映了送葬者的地位及与墓主人的亲疏关系；放置于二层台上、填土内的，其送葬者地位更加低下，或与墓主人的关系更加疏远，甚至可能为下葬活动中所使用的祭器。

妇好墓玉器为商代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妇好墓所处的殷墟二期恰为殷墟制玉、用玉的巅峰期，大量环形、弧形玉料和璧环钻芯的使用，说明工匠在制作玉器时经过周密的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料。殷墟时期的像生器有圆雕和片雕两大类。相对耗费原料的圆雕器物在殷墓中并不常见，妇好墓内却随葬有玉人、玉龙、玉虎、玉牛、玉熊、玉象、玉鸟、玉螭螂等大量的圆雕器物，反映了商代玉器造型和工艺的最高水准。常见于各类像生器的双阴线纹也是辨别商代玉器的重要特征之一。双阴线勾彻的羽纹、鳞纹等构件，

可与青铜器纹饰进行类比，能够为器物的精确断代提供依据。

四、殷墟玉器研究的未来展望

推进殷墟玉器的研究，首先有赖于出土玉器科学鉴定的普及。殷墟时期常用的玉石原料有软玉、蛇纹石、大理岩、石英岩类、绿松石和天河石等，对出土玉石器进行材质鉴定，能够有效地区分人们对各类玉石材质的利用。通过光谱分析还能够反映玉石原料中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从而提供玉料来源的线索。

系统的类型学分析仍然是殷墟玉器研究的重要内容。殷墟玉器出土数量庞大，内涵亦较为复杂。认识殷墟玉器的面貌，应排除前代旧器和外来文化器物。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妇好墓、小屯房址和西区墓葬，对于破坏严重但材料更加重要的西北冈王陵区，以及数量、质量较差，但埋藏环境保存更好，出土位置更加清晰的中小墓葬出土玉器的研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通过器物造型、纹饰的详尽分析，对出土玉器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玉器的变化趋势，也有助于对传世品、馆藏品的断代。晚商时期的玉器造型、纹饰与铜器的纹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部分玉鸟、玉兽面的造型，就与铜器表面的鸟纹和兽面纹较为相近。殷墟玉石礼器和像生器表常见的羽纹、鳞纹构件，亦是铜器表面的常见填充纹样。因此，将殷墟玉器的造型、纹饰与同时期的铜器进行类比研究，同样有助于玉器、铜器的分期断代。

殷墟出土的部分玉石戈（璋）、柄形器和容器上发现有朱书或墨书的铭文，铭文涉及的器物名称、所有者人名、祭祀名称、记事内容等，对于认识器物功能有着重要作用。在甲骨金文中，亦提到有诸多玉器名称。出土玉器实物和甲骨金文所涉玉名的对应，亦是一项艰巨的研究课题。

目前经过科学发掘的殷墟时期墓葬，数量早已破万，而其中出土玉器者（包括仿玉的石制品），约略可达千例。商代墓葬的丰富材料，为玉器使用习俗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周代已经出现了完善的用玉制度，其传统实则多承袭自商代。因此，商代用玉习俗（制度）的研究意义就不言自明了。玉器的出土位置与使用方式，玉器组合与铜器组合的关系，玉器与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关系，玉器使用的历时性变化等，都是有待于进一步阐明的问题。

注释

[1] 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北平北海公园内本所刊行，1929年。

[2]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中华书局，1948年。

[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6]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7] 梁思永、高去寻、石璋如、刘秀文：《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8]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9]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1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11] 见于打破M1002的M2246、打破M1003的M2254、打破M1217的M1488、侯家庄东区小墓M1320。石璋如、刘秀文、冯忠美、赖淑丽：《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

[12] 高去寻、杜正胜、李永迪：《大司空村·第二次发掘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

[13]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

[14]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15]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16]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总第5册。

[17]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18] 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19] 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2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2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24] 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 版社，1982年。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 [36] 安阳市博物馆：《殷墟梅园庄几座殉人墓葬的发掘》，《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
-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薛家庄东南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2期。
- [40]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第8期。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 [4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 [4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安阳市博物馆：《殷墟戚家庄269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 [48]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49]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 [50]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
- [5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第2期。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9期。
-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梅园庄西的一座殷墓》，《考古》1992年第2期。
-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4年第5期。
-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 [63]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徐家桥村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 [6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第8期。
- [71]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考古》2007年第1期。
- [72]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 [76]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
- [7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的两座商墓》，《考古》2009年第9期。
-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 [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 [81]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 [82] 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璮”说》，《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 [83] 王永波：《牙璋新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曲石：《商代玉器》，《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 [84] 〔日〕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
- [85] 石荣传：《再议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
- [86] 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
- [87] 刘森森：《殷代玉器的类型学观察》，《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 [88]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 [89] 郑振香、陈志达：《近年来殷墟新出土的玉器》，《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 [90] 那志良：《古玉鉴裁》，台北国泰美术馆，1980年。
- [91] 郭宝钧：《古玉新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
- [92] 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 [93] 刘森森：《殷代玉器的类型学观察》，《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 [95] 杨建芳：《商代玉器分期初探》，《中国文物世界》1986年第4期。
- [96] 曲石：《商代玉器》，《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 [97] 刘敏：《殷墟玉器分类及组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 [98] 王巍：《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1989年第9期；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99] 吕建昌：《关于殷墟妇好墓玉凤的归属问题：兼谈楚文化的渊源》，《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荆志淳、徐广德、何毓灵、唐际根：《M54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00]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01] 石荣传：《三代至两汉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 [102] 任伟：《殷墟玉礼器研究》，《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 [103] 黄翠梅：《殷墟出土的有领玉环及相关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 [104] 邓聪：《从“新千古玉”谈商时期的玦饰》，《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 [105] 杨建芳：《商周玉鹿佩的演变》，《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续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 [106] 孟宪武：《商代筮卦的几组文物》，《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 [107] 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
-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09] 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
- [110] 夏鼐：《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 [111] 陈志达：《殷墟玉器的玉料及其相关问题》，《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 [112] 荆志淳、徐广德、何毓灵、唐际根：《M54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干福熹、孔德铭、马波：《安阳殷墟新出土玉器无损分析检测报告》，《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13] 荆志淳、徐广德、何毓灵、唐际根：《M54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14] 荆志淳先生曾在相关调查和研究中多次表达这一见解。
- [115] 黄可佳：《贡纳与贸易——早期国家的玉石器生产和流通问题初探》，《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
- [116]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第4期。
- [117] 蔡庆良：《刚劲严肃的时代面貌——试析晚商玉器风格的形成原因》，《故宫文物月刊》总第213期。
- [118] 陈启贤：《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工艺特征与微痕探索》，《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陈启贤、徐广德、何毓灵：《M54出土玉器制作工艺显微痕迹探索》，《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19] 丁思聪、蒋成龙：《古玉次生变化研究述评》，《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
- [120] 荆志淳、徐广德、何毓灵、唐际根：《M54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干福熹、孔德铭、马波：《安阳殷墟新出土玉器无损分析检测报告》，《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21] 荆志淳、徐广德、何毓灵、唐际根：《M54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22] 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连劭名：《安阳刘家庄商代墓葬所出朱书玉铭考》，《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李学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 [123] 王辉：《殷墟玉璋朱书文字蠡测》，《文博》1996年第5期。
- [124] 李学勤：《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 [125] 刘源：《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26] 郭宝钧：《古玉新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年。
- [127] 刘森森：《殷代玉器的类型学观察》，《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28] 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 [129]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30] 常洁：《殷墟墓葬所见玉器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 [131] 荆志淳，唐际根：《商代用玉及其反映的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第11版。